新中国写作教材的“历史化”与史料批判——兼论中文创意写作教材建设

张宝元

摘要：新中国写作教材是写作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一类史料。将教材从“用后即弃”的教学工具提升为考察写作学科制度史、教学史与社会史的“方法”，是其“历史化”的题中之义。新中国写作教材史料可引入金宏宇的“史料批判”理论，从辑佚、目录、版本、考证等基础批判，到出版机制、生产机制与“一体化”的深透批判，再到史料观层面的形上批判，进而勾勒写作教材史料研究的方法脉络。当下中文创意写作教材建设热潮须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写作教材编写历史经验为基石，警惕“概论思维”，使创意写作教材本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为构建中国写作学自主知识体系夯筑史学基础。

关键词：写作教材；“历史化”；史料批判；创意写作；教材建设

The “Historicization” of New China’s Writing Textbook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 Criticism: With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Textbooks

Zhang Baoyuan

Abstract: New China’s writing textbooks are a categ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long neglected in the study of writing history. Elevating textbooks from “disposable” teaching tools to a “method” for 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teaching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riting discipline is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their “historicizati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New China’s writing textbooks can introduce Jin Hongyu’s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 criticism,” proceeding from basic criticism such as compilation of lost texts, bibliography, editions, and textual research, to penetrating criticism of publication mechanisms, production mechanisms, and “integration,” and further to metaphysical criticism at the level of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by outlining the methodological thread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writing textbooks. The current boo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textbooks must tak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writing textbook compil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s its cornerstone, guard against “survey-thinking,” enable creative writing textbooks themselves to achieve “creative writing” in a true sense, and lay a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writing studies.

Keywords: writing textbooks; “historiciz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 criticism; creative writing; textbook construction

教材不仅是传播知识的主要文献载体，更是国家事权。[①] 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开设过写作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文创意写作正式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情况下，重新梳理、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写作教育史，尤其是写作教材编写、建设史不只是写作学科的内部事务，而且是教材建设这一国家事权的应有之义。

“ 史料之重本是所有学术研究的共性，不仅于史学性方向的研究。”“ 当代文学研究之重史料，乃至有史料学转向之说，有其特定原因，但归根结底也是学术研究共性的表现，并不能因此说可以有不重史料的当代研究 ”“ 史料研究可以是当代研究的一个单独领域。 ”[②] 因而，重新审视写作史，乃至“ 重写写作史 ”的基础在于史料。就写作教材史这一方面来看，近年来，涉及将写作类教材或读物作为史料系统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已渐次展开：在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领域，华东师范大学刘晓军对近现代“ 小说作法 ”一类著述（包括教材）的系统搜集与整理[③]，使清末民国的写作类教材作为史料系统性地进入学术视野；武汉大学陈建军、戚慧对民国时期武汉大学“ 作文 ”教学与讲义的梳考[④]，以武汉大学为个案展示了民国大学（高校）写作教材（讲义）的史料价值；武汉大学宋时磊倡导创意写作学科史料学的建构[⑤]；上海交通大学吴俊与王明宪先后合作发表“ 清末民国 ”“ 新中国六十年 ”及“ 创意写作落地到确立期 ”三个时段[⑥]多篇写作类教材调查报告等文章，对晚清以来的写作教材史料爬梳之勤、搜罗之广，有意识地为写作教材史料构建工作建立了一个相当高的起点。上述大都挂一漏万而言，仅是就近年来相关成果匆匆观之，但由此可窥写作教材尤其是“ 写作老教材 ”作为一种史料，其学术价值正在被学界重新认识并愈加重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写作史与当代文学史之间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⑦] 新中国成立后写作从来不是孤立的技能训练，它始终同当代文学制度的运作缠结在一起。在“ 十七年 ”时期，写作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意味，“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但绝大多数高校绝大多数专业（不仅中文系及文史类等相关专业）都将写作课列入必修课程。“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这一陈陈相因的说法，也正是在写作教学与当代文学制度的张力之中生成的一种特殊话语。[⑧] 写作教材因而不仅是写作教育

①2026 年 9 月 8 日，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参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人民日报》2026 年 9 月 9 日。

② 吴俊：《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文学评论》2020 年第 6 期。

③ 刘晓军：《近现代小说作法论著资料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 年。

④ 陈建军、戚慧：《民国时期武汉大学“作文”教学研究》，《写作》2019 年第 6 期。

⑤ 宋时磊：《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史料学初论》，《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⑥ 参见王明宪、吴俊：《现状考察：创意写作“落地”中国到二级学科的确立（2009—2024）——中国创意写作教材编撰及图书出版调研报告（三）》，《文艺争鸣》2025 年第 12 期；王明宪、吴俊：《当代六十年（1949—2009）创意写作的阶段性成长——中国创意写作教材编撰及图书出版调研报告（二）》，《文艺争鸣》2025 年第 10 期；吴俊、王明宪：《创意写作“史前期”：清末民国的写作类教材及图书编撰述评——中国创意写作教材编撰及图书出版调研报告（一）》，《文艺争鸣》2025 年第 8 期；吴俊、王明宪：《关于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及教材编纂的探讨与建议》，《文艺论坛》2025 年第 4 期。

⑦ 笔者所受启发来自博一学期吴俊教授讲授的创意写作课。上海交通大学吴俊教授在 2026 春季学期创意写作研究生课程“创意写作：历史、理论、实践”中即反复强调了当代文学史与写作史之间的重要联系，提出应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观察研究写作史。

⑧ 华东师范大学黄平教授提到：“杨晦与‘五四新文学’渊源极深。他之所以在 1950 年代继承罗常培的讲法，在彼时再次强调大学不培养作家，或许也思虑到‘工农兵创作 / 专业文学创作’在 1950 年代的博弈。强调不培养作家，也就隐含着维护学院的独立性，与工农兵作者保持微妙的距离。”参见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当代文坛》2024 年第 1 期。

发展和写作学科自身的史料，也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制度、文学教育与文学生产的一个独特窗口。一部写作教材中所提供的参考范文篇目选择与文体设置，往往比文学史著作更直接地透露出一个时代的文学秩序如何被组织和传递。在这个意义上，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写作史尤其是写作教材的历史，并系统性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写作教材史料进行梳理与研究，也正是在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处学术增长的视角。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1979年这一时间段而言，写作教材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十七年”时期，高校写作教材并无统编版本，各校多由教师个人或写作教研室自编自用，大量真正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油印讲义、内部教材与“征求意见稿”，以非正式出版物的形式流布于校园与课堂，课后即散佚，图书馆中大都“剔旧”、书目不载。这类作为非正式出版物的教材讲义恰恰是考察真实写作课堂重要史料。这些真实应用于教学的史料或许是最能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写作教学的实际面貌的个窗口，其史料价值非但不低于正式出版物，某种意义上还在其之上[①]。如果能在吴俊、王明宪等学者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这类非正式出版的写作教材史料系统纳入考察，新中国写作教材的建设图景无疑会更为完整与清晰。

正如程光炜曾经多次提到“抢救当代文学史料”[②]，可以说，新中国写作教材史料也可以被视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重要的“当代文学教育史料”而亟待“抢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写作教材建设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应被视为中文创意写作学科未来发展及教材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与基础。回顾这些“老教材”，当然不是为了重复其教学方法，而是为了考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作及写作教材如何同社会发生关系、发挥作用，并由此思考今天的创意写作教育应当向何处去。

一、从“刍狗”到“方法”：新中国写作教材的“历史化”

对一门学科而言，对其自身历史的书写与“书写史”的回顾，往往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例，其二级学科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陈伯海发起并主持的“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专门领域[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则有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④]“史”到“史学史”的转折说明，当一门学科的叙述积累到一定程度，对叙述本身的反思便成为学术自然内生以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写作学科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总结时刻。二十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之初，刘锡庆主编的《中国写作理论史》（1993年）、潘新和的《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1997年）、王钦韶的《中国现代文章写作学的历史发展》（1997年）、王志彬的《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杨荫浏、张恩普主编的《中国现代文章写作理论发展概要》（2002年）等相继问世，裴显生曾将后两部并称为21世纪初期写作学的“双璧”，认为它们“填补了我国写作学领域的一个空白”[⑤]。就研究格局而言，这些著作大体完成了对写作理论与写作

① 已著录的出版物中，是否曾作为教材真实投入教学、实际影响力如何，均需征诸教学档案与使用者回忆加以考实，不能以某一写作教材或出版物发行量多少而简单认为其影响力大或小。

② 程光炜：《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参见《“文学史学史”的诞生与评价》，《人民政协报》2003年10月14日。

④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 杨荫浏、张恩普：《中国现代文章写作理论发展概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2页。

教育之“史”的勾勒，写作学科似乎也有了自己的历史或教材“编纂史”。然而，只需要大略翻看便一目了然，这些写作史著梳理的对象，主要是理论著作、教育制度与著名学者的论述，而教材——尤其是那些真正投入课堂使用的教材，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其中唯有《中国现代文章写作理论发展概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着墨较多，设专节评介五六十年代及新时期的主要写作论著，已属同类著作中最为用力者，但其评述对象仍以公开出版的理论著作为主，且自述其性质仅为“概要”。这并非史家疏漏，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七年”时期，高校写作教材并无统编版本，“各地、各校都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状况”[①]，教材多由教师个人或写作教研室自编自用，以油印讲义、内部印本，搜集之难远非公开出版物可比。黄修己为撰《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辗转搜求任访秋四十年代讲稿整理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遍查各大图书馆未得，最终靠河南大学刘增杰教授从作者本人处觅得复印件，可谓“海内孤本”，仅此一书的搜求前后历经六年[②]。史料之难觅可见一斑，而由此反过来又加剧了叙述中对教材的回避乃至“遮蔽”，久而久之，“写作学科的历史”便被不自觉地写成了“写作理论著作的历史”，真正在无数课堂中有着使用记录的写作教材反而成了“潜在写作”。

这就触及了本文所谓“历史化”的第一层含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写作教材在绝大部分写作史研究中，尤其是这些课堂真实使用的内部讲义、参考资料等，从未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应当系统收集、整理与研究的文献。不妨做个比方，这正如所谓“刍狗”，刍狗是祭祀所用之草狗，祭祀前很重视，没有的话又很着急，但又是祭毕即弃。过去大多写作教材的命运或使用周期大概类似，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便是正式出版的写作教材，也大多在“教材半衰期”中迅速失去教学价值。在工具理性的视野里，教材是纯粹的“手段性存在”，价值完全系于使用，使用终结之日即其生命终结之时。由此形成一种“消费品”而非值得研究的对象。

然而，越是当时稀松平常不被珍视的文本，往往时过境迁后，越能保存一个时代的真实肌理。正如鲁迅所言：“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③]历史上的正史或经删定而趋于圆整，档案也会或因有意留存或损毁而难免存饰，反倒是民间账簿，商业契约，俗曲戏单，油印课本这些史料，因民间性、广泛性、丰富性和时效性，最大限度地留存了历史生活的原貌。就写作学科而言，一本讲义上保留的方法讲解、篇目选择、习题设计乃至油墨浓淡、纸质粗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写作教学现场的直接痕迹，因无“统编”之故，一所高校的“写作教学大纲”，往往可以折射出课程制度、时代要求与教师知识结构的复杂的“教材协商”可以说，不经过教材这一层，所谓“新中国写作教育史”便只是悬浮于课堂之上的理论史。

“历史化”在这里因此有了第二层，也是更积极的一层含义。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开篇即提出“总是要历史化”的口号[④]。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写作教育的历史无法绕过教材文本来接近，

① 同上书，第 370 页。

② 有关黄修己先生搜求任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事，参见陈希：《从文学史到学科史——黄修己的学术研究及启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 年第 6 期。

③ 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9 页。

④〔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前言第 1 页。

那么教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资料工作，而是重建这段历史的阐释前提。近十余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历史化”的讨论颇为热烈，相关论者强调以“辩证的或总体化的”思维将研究对象放回历史情境，反对将历史“本质化”“绝对化”[①]。写作教材的“历史化”正应作如是观，它要求我们把教材从“好不好用”“过不过时”的简单“工具性”评价中解放出来，放回其生产、流通与使用的历史情境之中，追问为何如此编写、如何被使用、又怎样参与了一个时代写作秩序的建构。

由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写作教材就不再仅仅是研究“对象”，而是被提升为一种研究的“方法”，不妨称之为“作为方法的写作教材”，经由教材，可以重新认识写作学科的诸多根本问题。譬如学科的合法性，写作的学科化并非由理论思辨推演而来，而是由课程的必要性赋予合法性、再由教材的急迫性凝聚出学界共识，而1980年中国写作学会的成立，正是与各高校编纂教材、商定大纲的集体行动同步完成的，教材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枢纽功用。再譬如写作与社会的关系。“十七年”时期写作所承担的工农兵方向与政治功能，如何具体落实在一节写作课、一篇命题作文、一种文体训练之中，只有教材能够给出答案。又譬如知识的生产机制：一部教材从教研室讨论、油印试用、征求兄弟院校意见到正式出版的完整链条，呈现的是学术知识被筛选、被规训、被体制化的微观过程……凡此种种，都说明教材不是写作学科史的边缘材料，而是切入学科制度史、教学史与社会史的核心通道。将教材由“刍狗”还原为“方法”，写作学科的历史图景方为完整。

那么，何以说新中国写作教材已经到了“历史化”的时间？就外部条件而言，教材建设的战略地位空前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迈入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2026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和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原创性教材体系，教材研究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与现实动力。就内部条件而言，一方面，创意写作学科化不断推进，从2006年复旦大学设立首个“文学写作硕士班”，到2009年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成立，再到创意写作进入学科目录成为二级学科，上海交通大学招收“中文创意写作”博士研究生……这些使得“写作教育向何处去”以及学术化思考成为无法回避的真正的现实问题，而对未来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清理之上；另一方面，作为史料的新中国写作教材的物理寿命正在加速终结，若不及时抢救性搜集，这段历史的研究将愈发艰难。可以说，无论是现实问题的倒逼，还是史料保存的紧迫，都把新中国写作教材推到了必须被“历史化”的时刻。

当然，“历史化”绝不意味着将一些写作教材高高捧起，“囫囵吞枣”地供奉进学术史的宫殿。恰恰相反，正因为教材是深度嵌入社会政治、课程制度与出版机制之中的文本，它的史料特性远比一般文学文献复杂，包括版本混乱、编者模糊、文本与课堂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清……凡此种种，都要求在“历史化”的同时辅之以严格的“史料批判”。

二、史料批判：新中国写作教材研究的方法自觉

如果说“历史化”解决的是现在对新中国写作教材“值不值得研究”的一个价值性问题，那

① 吴秀明：《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需要正视的八个问题》，《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么接下来必须回答的是“如何研究”，尤其当研究对象是一批版本混乱、作者归属模糊的文本时，史料批判的方法是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在这方面，同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界的史料理论已经提供了成熟的方法资源，其中最具系统性，又便于写作学科迁移参考的或是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提出的系统性的“史料批判”理论。

（一）“史料批判”的理论框架

“批判”自然不是某些语境下的“大批判”，而是对研究对象加以评断、考究与甄别，为知识的运用划定合法的界限。金宏宇的问题意识，正是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长期存在的“重阐释、轻史料”，大量研究建立在未经检验的史料的情况上[①]，史料批判即要为史料的运用建立一道前置的检验程序，在同情地了解史料之外，更要保有“多闻阙疑”乃至“不疑处有疑”的批判精神[②]。

就方法谱系而言，具体展开为八种相互支撑的“批判”[③]：其一，辑佚批判，针对散佚文献的钩沉与复原；其二，辨伪批判，甄别伪书，考订文献的真实作者与真实年代；其三，版本批判，考察同一著作不同版本（手稿、初刊、初版、修订版等）之间的文本变异，从异文中发掘历史信息；其四，校勘批判，比勘异同、订正讹误，为阐释提供可靠的文本基础；其五，目录批判，借助目录之学考镜源流，摸清一个领域文献的家底；其六，考证方法批判，对文献的作者、年代、本事、传播等史实问题加以考实。其七，注释批判，对文献的注释加以考察，阐明正副文本之间的关系。其八，汇编批判，对文献汇编这一专题化、组织化的类型进行思考。其中最适合写作教材史料的大概主要是辑佚、目录、版本与考证这四部分。

金宏宇教授并未止步于上述八种“批判”，而是进一步将史料批判区分为三个递进的层级：基础层级的批判[④]，考订史料的真确性、完整性与异同性，回答“史料是否可靠”的问题；深透层级的批判[⑤]，从发生学与形构论的角度，审辨史料的生成机制、编纂意图与思维框架，回答“史料何以如此”的问题；形上层级的批判[⑥]，则上升到史料观的反思，追问史料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材料性与话语性等本质属性，警惕史料虚无主义与史料至上主义两种偏向，回答“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史料”的问题。这一理论虽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而设，其问题意识与方法结构却几乎可以无缝移用于同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新中国写作学的教材研究。

（二）写作教材史料的基础批判：以辑佚、目录、版本与考证为例

我们对新中国写作教材“家底”的掌握，至今仍是残缺而模糊的。正如四川大学刘福春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收集中国新诗文献，可谓“摸清中国新诗文献家底的第一人”，在写作教材史料研究中，距离“摸清”实在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甚至也可以说是刚刚起步阶段。以辑佚与目录言之，当务之急是编制一部尽可能完备的“新中国写作教材总目”。目前学界对写作类教材的著录已有可观进展，上文所提到的吴俊、王明宪的调查报告即为例证，但其新中国部分的著录基本限于公开出版物，而“十七年”乃至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写作教材多以油印讲义、内部印本、“征求意见稿”

① 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导论第 1 页。

② 同上书，导论第 9 页。

③ 同上书，参见目录 1—3 页。

④ 同上书，导论第 7 页。

⑤ 同注④。

⑥ 同注④。

的形式存在。这意味着，现存可搜集容易搜集到的教材史料存在显著的“幸存者偏差”，如果我们能够讲述的历史，只是很容易找到的明面上流下来的那段历史，则难全窥原貌。史料批判的第一层工作，便是通过有计划的访求、征集、口述访谈与目录编写，将散佚状态的教材史料最大限度地钩沉出来。

版本批判则是写作教材史料研究中最具特性的一环。新文学版本研究早已注意到初刊、初版与修订本之间的变异，而写作教材的版本问题另有其独特形态：由于教学周期的驱动，一部教材往往存在从内部油印讲义、征求意见稿、修订讲义到正式出版本的漫长变异链。以笔者考察所及，南开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1974年编印的《文艺创作教材》明确标注“征求意见稿”，1976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组编《文学体裁的写作知识》同样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在高校间交流，此类文本处于未定稿状态。同一教材的内部本与公开本之间，往往存在增删改写，这些增删处正是版本批判应当着力发掘之处。

此外还须辅以考证与辨伪：其一，考订教材之“身份”，现存著录为“教材”的出版物中，相当一部分实为一般性写作读物，是否曾真正投入课堂、使用范围与影响力如何，均须征诸教学档案、使用者回忆与同时期教学文献加以考实，而不可见“写作”二字即坐实为“教材”；其二，考订编者与年代，集体署名的“写作教研室编”背后，是哪些具体学人执笔？凡此皆需一一细细察考。

（三）写作教材史料的深透批判：出版机制、生产机制与“一体化”

教材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又被何种机制与意图所形构，引入出版史的视角尤为必要。写作教材的出版史完全可以成为沟通出版史、教育史、当代文学史与写作学科史的桥梁加以系统性考察。除前文所提到的广泛的内部自编自印的写作教材之外，对正式出版的写作教材的研究虽已基本了解其史料图景，但依旧未能就一些个案持续深入。如以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例：早在1956年，该社即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理论组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收录大量作家论写作的文章，对全国中文系的写作教学影响深远；此后又陆续推出《关于政论文的写作》（1958年）、《应用文选读和写作》(1959年)、《政论文写作参考资料》(1960年）等。改革开放后，该社更成为国内写作教材出版的重镇，自欧阳周《大学实用写作》（1982年）、刘锡庆主编《写作》（1988年）至吴伯威等主编的《写作》（1992年），数十年间写作教材绵延不绝，构成了一个可观的“写作教材群”，90年代至新世纪后更是不胜枚举。高等教育出版社至今依旧持续出版着国内种类繁多、数量旁大的写作类教材。对这样一个国家出版社所出版的“教材群”作分时间段的考察，如梳理其选题规划、与高校写作教师的长期合作、教材出版的获奖……其所呈现的就不只是一份出版书目，而是国家出版机构如何介入并塑造写作知识生产的完整机制。推而广之，人民教育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各省级人民出版社与大学出版社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写作教材，皆可作如是考察研究。由若干出版社的“教材群”交织成网，一部“新中国写作教材出版史”或许便能立体地浮现出来。

与出版社机制相平行的，还有写作教材生产的另外两条线索，同样需要深透批判的审视。其一是高校内部的自编机制：“十七年”时期写作教材无统编版本，由教师个人或写作教研室集体编纂，赵景深在复旦编写《文选与习作》油印讲义（1954—1955学年）、1961年华南师范学院又有由写作指导教研组所著《写作指导讲义》等教材。山东大学中文系编《文科写作课教材》（1961年）

等笔者所见数百种油印或铅印写作教材皆是其例，不再一一列举。这类教材同课堂的贴合度最高，最能反映教学的真实状况，其编纂过程本身即发生学研究的绝好对象。其二是面向社会与行业的写作教材生产：如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廖子东曾为中南军区师范学校语文系讲授《写作讲话》汇编而成的油印教材。广播电视教育兴起之初，广州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 1965 年即编有《写作基础知识讲义》；吉林省直属机关业余大学编有《文选与写作》（1960 年），供机关干部业余学习之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写作学会及其各地分会举办写作讲习班、编印讲演录（如 1982 年“全国高校第一期写作教学讲习班”油印教材），写作教材由此溢出高校围墙，延伸至工农兵与在职干部培训的广阔场域。这方面的典型个案还有常青的“速成写作法”：作为军队文化教员，常青因教写作而获得“特等功”，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何教授工农兵快速写作？常青的“速成写作法”教学经验作为教学资料先以部队内部资料的形式在军区间流布，继而在《学文化》杂志连载，1954 年由工人出版社列入“学文化小丛书”整理出版为《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初步经验》，同时又被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地方出版机构翻印推广，最终服务到全国的扫盲实践——一部工农兵写作教材由内部讲义走向全国的过程，几乎囊括了版本批判与考证批判所要处理的全部问题，值得作为深透批判的样本专门疏考。[①] 这些“边缘”的教材，恰恰是考察写作如何同社会各阶层发生关系的第一手材料。

写作教材史料的深透批判，还应该将写作教材纳入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框架中加以理解。当代文化与文学的“一体化”在写作领域的微观呈现过程中，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写入教材，到写作教材章节的更改与设置（如写作教材中“革命小戏的创作”章节），再到 1980 年代写作学会以编纂大纲凝聚学科教学共识，教材始终是时代意志进入写作课堂的通道，数量庞大的内部讲义，在统一规范的缝隙中保存了多样乃至异质的教学经验，构成了“一体化”之下涌动的潜流。

（四）写作教材史料形上批判：作为教材史料属性的反思

形上批判上升到史料观的层面。对写作教材研究而言，最需要反思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默认等式——认为教材文本等于教学实践。事实上，教材的编写是一回事，教材的讲授与接受是另一回事。讲义上的篇目未必都讲，课堂上的发挥未必见诸文本。一部教材的编纂意图与其在实际教学中产生的效果之间，往往存在不小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我们必须承认，写作教材作为史料有主观性、建构性与话语性，但我们并非要一概否定，同时，我们也不应滑向史料至上主义，以教材的丰富罗列堆砌代替深切的历史研究。

综上所述，经由上述三个层级的批判，新中国写作教材史料才能从一堆故纸，转化为可供深入研究与历史写作的基础史料。当我们以这些批判过的历史经验反观当下如火如荼的创意写作教材建设时，史料批判的方法也就自觉也自然地转化为创意写作教材建设的启示。

三、写作史视野与中文创意写作教材建设

历史化的梳理与史料批判的检验，最终要回应的是当下。就写作学科而言，当下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无疑是创意写作教材建设的热潮。自 2009 年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成立、创意写

① 相关内容可参见笔者拙文《工农兵写作教学的“常青经验”及其历史展开》。

作开始学科化进程以来，教材建设便同步推进：许道军、葛红兵等著《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2012 年）代表了创意写作引入国内后教学草创期的重要教材成果；近年来，随着创意写作进入学科目录成为二级学科，教材编写更呈井喷之势——西南大学李金凤主编的《中文创意写作》（重庆大学出版社，2025 年）；中国人民大学杨庆祥主编的《中文创意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 年）；同济大学张生的《小说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 年）；上海交通大学吴俊领导的编写团队亦有《类型小说创意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 年）教材问世。可以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创意写作教材已经从无到有、从译介引进走向本土原创，形成了一股可观的建设潮流。

然而，热潮之中尤须要拎清的问题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写作史（写作教育史或写作教材史）上来看，以及从教育评价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文学教育和教材选用、研究长期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失衡：重“编”与“用”，轻“评”与“思”。教材编写立项时轰轰烈烈，投入课堂几年后就寂然无声，然后再轰轰烈烈编起来。对此前教材实际使用效果、学生接受状况与历史成败得失的反思与评价环节，始终付之阙如。以至于原地打转，进步缓慢，乃至学界不少学者一提教材，都认为是不值得编写、使用和研究的“小儿科”。对教材尤其是写作教材的普遍性“失望”不能把责任全推给编写者，这是一个教育结构与学术评价体系的长期性问题，尤其是涉及写作教材，写作能不能教，教的效果如何，长久以来都缺乏一个调研的过程。

教材往往在“编写、使用、淘汰”的循环中完成其生命周期，却极少有人在淘汰之后回头追问教材在当时何以如此编写？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又制造了什么新问题？这正是笔者前两部分反复提及之处。如果我们对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写作教材缺乏历史化的梳理与批判性的反思，那么今天的创意写作教材建设，便很可能在不知不觉间重蹈历史的覆辙，甚至“吃二茬苦，受二遍罪”是一定的，不仅要重蹈以理论概论代替训练实践的“概论思维”[①]，更要重蹈教材因课而编、课后而废的“中间物”命运。创意写作教材建设的首要前提，恰恰未必要全国各校都“大干快上”急于编写写作类新教材，而最好能够先有组织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写作课教学与教材编写的历史进行系统回顾与考察。

这些写作教材历史化与史料批判沉淀下来的经验，能够为创意写作教材建设提供至少三点宝贵经验：

其一，从教材与社会的历史中，确立“写作何为”的问题意识。新中国写作教材的变迁史表明，凡是有生命力的教材，都是准确回应了时代之问的产物，50 年代教材回应“工农兵方向”，80 年代教材回应学科重建，而今天的创意写作教材，理应回应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创意人才的需求，回应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之下中文专业人才能力重塑的现实压力[②]。

其二，从教材生产机制的历史中，汲取集体协作与开放性编写的经验。80 年代“会议、大纲、教材”的编写链条、全国性教学大纲的交流互鉴、写作学会对编写力量的凝聚，说明好的教材从来不是书斋独撰的产物，而是编写者、出版者与使用者在反复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创意写作教材的建设，同样需要在编写者、出版者与使用者的交

① 施爱东：《“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西北民族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张纯静：《创意写作本土教材编写理念与建设路径》，《教师教育学报》2021 年第 3 期。

互层面形成开放机制，使教材保持修订更新的活力，而非一锤子买卖。

其三，从教材形态的历史中，获得创新的勇气。“十七年”时期那些因地制宜、与课堂高度贴合的手刻油印讲义，广播电大时代的铅印讲义，乃至面向社会各阶层的培训教材，提示我们教材形态本应是多样的；创意写作教材既然以“创意”为名，教材自身首先就要“创意写作”。在体例设计、训练模块与媒介形态上超越传统“规规矩矩”的写作教程，让使用者有体验感、有参与感，使教材不再沦为随弃的“刍狗”，而真正成为可反复使用的学习伙伴。当然，这种创新必须以守正为基础：所谓守正，正是建立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写作教材建设经验与教训的清醒认识之上。而面向未来，教材形态的创新更无法绕开人工智能这一变量。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托数十年积累的高质量教材语料，自主研发的“龙凤教育文化大模型”已于 2025 年通过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该模型集成二十多个学科垂直领域大模型和近千个教学智能体，可以提供教材内容润色改写、教学大纲与课件生成、学科知识问答等服务[①]。就写作教学而言，这意味着应用文写作等训练环节正在获得大模型的专项支撑，教材也由此开始从静态的纸质文本向“教材 + 智能体”的新形态演化。未来的写作教育，必然是与人工智能深度结合的教育。创意写作教材的“创意”，在今天理应包含对这一技术变量的正面回应。

结语

写作教材史料的收集其实是为了指向一个更宏观的写作史料学的庞大学术工程。这个工程的最终形态，是未来写作学科应该实现的重要目标，落实结果应是一部贯通的“中国写作教育史”和“中国写作教育史料汇编”。本文所提及的“写作教材史”也仅仅是笔者所能略知一二的上述内容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大写作史”应上承古代文章学与近代“小说作法”的传统，中经民国时期写作教学的积累，下贯新中国七十余年的教材编纂与教学实践，直至当下中文创意写作教材的创新探索，将散落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出版形态之中的写作教材与各种写作教育相关的史料，纳入“大写作史”的视野下系统梳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理解这一转折，就无法理解此前民国教材传统的延续与断裂，也无法理解此后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兴起的土壤与条件。

写作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不可能从对西方创意写作教程的译介与模仿中长出，而必然要从对中国写作教育自身历史的清理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写作教材的历史化梳理与史料批判，正是中国写作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

致谢

本文初稿为 2023 年东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年会宣读的获奖论文《新中国高校写作教材的历史梳理与创意写作教材建设——从杨荫浒、张恩普〈中国现代文章写作理论发展概要〉谈起》，后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出版事业部分社长张晶晶、武汉大学宋时磊与上海交通大学张先飞等专家鼓励下修改成文。

作者简介：

张宝元（2000—），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2025 级博士研究生。

① 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教社“龙凤教育文化大模型”顺利通过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高等教育出版社官网，2025-09-22，https://www.hep.com.cn/news/show/gao-jiao-she-long-feng-jiao-yu-wen-hua-da-mo-xing-shun-li-tong-guo-guo-jia-sheng-cheng-shi-ren-gong-zhi-neng-fu-wu-bei-an-FK4GMQZ9JC。